

底層政治與革命精英： 資源動員理論的視角

● 胡悅晗

美國社會學家魏昂德 (Andrew G. Walder, 又譯華爾德) 指出, 隨着俄國和中國革命的發生, 二十世紀目睹了一批特殊類型的黨政合一政權的誕生與成熟; 在現代權威主義制度裏, 共產黨領導的國家政權最穩固, 組織最完整, 最不為社會集團利益所影響, 對原有的政治和經濟結構改造得最為徹底^①。

在關於中國共產革命之性質判斷問題上, 歷來存在兩種觀點。費正清 (John K. Fairbank) 等老一代海外中國研究者認為, 中國的共產革命是一場溫和的現代化改革被攔腰截斷的後果, 與之相伴的, 自然是集弱勢獨裁與現代化導向為一體的國民黨政權在中國大陸的失敗。晚近較為激進的新一代中國研究者則認為, 中國的共產革命是一場反現代化的現代化運動。雙方觀點儘管各樹一幟, 但均建立在同一個事實判斷的基礎之上, 即中國共產革命主要由被邊緣化的知識份子組成的革命精英所主導, 並動員大量底層民眾參與其中才得以完成。正如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所提出的二十世紀中國革命中的一個悖論現象:

作為社會精英的知識份子, 領導了一場反對他們自己傳統的革命^②。

然而, 正如杜贊奇 (Prasenjit Duara) 所指出的, 「歷史在中國和其他地方成為民族國家的歷史, 它趨於敘述一個走向統一的民族, 並且成為民族國家規劃的一部分, 這種規劃給予民族國家特權, 壓制分歧和多樣化——除非分歧和多樣化得到民族國家的批准。」^③長期以來, 有關共產革命中底層民眾的研究一直被鑲嵌在由民族國家的代言人——革命精英所主導的革命史敘述話語中, 而無法窺見其主體性。

新一代中國研究者認為, 中國共產革命是一場反現代化的現代化運動, 主要由邊緣化知識份子組成的革命精英所主導, 並動員大量底層民眾參與其中才得以完成。作為社會精英的知識份子, 領導了一場反對他們自己傳統的革命。

一 底層政治與革命精英——中國共產革命的主要力量

其實, 中國社會革命的獨特之處在於, 「社會結構與政治結構的根本性變化以一種相互強化的方式同時發生。而且這些變化的發生要通過劇烈的社會政治衝突來實現。」^④中國現代國家構建之所以在社會革命發生前後命運

近來中共黨史研究跳出了以往「人民群眾在精英的領導下創造歷史」的主流敘事，將動員視為一種發生在多個場域，涉及底層與精英等不同社會階層的持續互動過程，揭示出現代中國革命過程中鮮為人知的另一面。

迥異，一個關鍵性的原因即在於，中國共產黨在推進社會革命的過程中運用了一種特殊的權力技術——政治動員，而這一權力技術的運用對現代國家構建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促動作用^⑥。如果把1923到1945年作為一個整體來看，中國共產主義運動的成功與可以度量的經濟、社會及文化因素並無重大的相關關係。相反，關於中國共產主義運動成敗的解釋必須在「中國共產黨人自身的行為」中尋找^⑦。

相較於國民黨以地方士紳、資產階級等社會中上階層為動員對象所採取的精英動員方式，以中下層知識份子為核心的中共將工人、農民視作動員對象，採取底層動員的方式，使他們參與其中，用政治話語形塑了他們具有階級認同感的底層意識。美國人類學家查特吉 (Partha Chatterjee) 通過對歐美學術界流行的國家與公民社會理論的系統批判，提出了底層政治研究的核心概念——政治社會，認為在許多第三世界國家的革命運動中，底層民眾的鬥爭影響着社會的發展和民主的進程，是真正意義上的政治^⑧。毛澤東比斯大林更懂得透過階級鬥爭來動員多數群眾，也更懂得如何利用各種資源的重新分配，來製造使居少數地位的反對者就範的逼人形勢^⑨。因此，資源動員理論是探究中共集權主義國家體制的起因與發展的一個重要視角。

受西方學界的影響，資源動員理論正逐漸成為近來中共黨史研究的新視角。愈來愈多的研究者通過引入相關動員理論，重新探究中共早期的歷史^⑩。這些研究跳出了以往「人民群眾在精英的領導下創造歷史」的主流敘事，將動員視為一種發生在多個場域，涉及底層與精英等不同社會階層的持續互動過程，揭示出現代中國革

命過程中鮮為人知的另一面。因此，考察該理論的興起過程及其在黨史研究中的運用，對於我們將中共的創建與發展過程放入歷史與社會的語境中，更深入地理解現代中國革命的根源與軌迹，具有重要作用。

二 資源動員理論的興起及其在黨史研究中的運用

社會學對於社會運動或革命的研究致力於其形成原因與主要規律兩方面：對形成原因的考察多集中於各種可能性外部誘因的宏觀分析，對主要規律的考察多集中於運動或革命進程內部的中觀與微觀機制的分析。早期歐美主流政治學與社會學家側重於前者，把社會運動視作社會中的病態行為，將其視作由相對剝奪感、社會怨恨等多種因素的疊加聚合所導致的社會非常態過程。1960、70年代以來，新一代美國學者提出社會運動是人們對嚴酷的現實與壓制性政治體制的一種挑戰^⑪。他們開始關注後者，即考察運動或革命進程中的各種微觀機制。資源動員理論也應時而生。儘管資源動員理論也認為社會中普遍存在的「不滿」是導致社會運動的直接原因，但其對導致「不滿」的結構性誘因並不關注。在資源動員理論看來，「不滿」僅僅是一種個體的心理狀態，它要轉化為行動狀態和集體狀態的社會運動，必須經過一個「資源動員」過程^⑫。

與傳統心理學側重個體性格特徵與心理狀態分析不同，資源動員理論強調在一系列利益得失博弈中的心理過程；認為運動參與者的參與意願源於對運動所付出的代價與個人收益兩

方面綜合判斷後的理性抉擇^②。這種理論構建的模型強調資源、組織及政治機遇，其關注點在於利益的聚集方式以及在此過程中各種相關資源的利用^③。該理論的代表人物蒂利(Charles Tilly)認為，一個成功的集體行為是由以下六個因素決定的：(1) 運動參與者的利益驅動(interest)；(2) 運動參與者的組織能力(organization)；(3) 社會運動的動員能力(mobilization)；(4) 個體加入社會運動的阻礙因素或推動因素(repression/facilitation)；(5) 政治機會或威脅(opportunity/threat)；以及(6) 社會運動群體所具有的實力或權力(power)^④。在他看來，這些因素通過特定的組合而對集體行為的形成和進程產生影響。

在歷史研究日益借鑒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的趨勢下，晚近的黨史研究者開始將中共的社會動員放入地域社會的背景中，將鄉土社會中的地緣、親緣等網絡關係納入其中，開始探析這一過程中革命精英如何吸納各種相關資源為己所用，進而揭示中共的革命精英、地方精英與底層民眾之間的複雜互動過程，以及體現出的地域文化影響。

具體而言，目前有關研究主要呈現出以下幾個方面的特點：

首先，將地方精英納入研究視野，拓寬了「精英」的概念內涵。傳統黨史研究主要關注以構建現代民族國家為目標的職業革命家群體，這個群體主要由受過一定教育的知識份子所組成。而晚近的研究則將地方精英納入研究範圍內，開始認為中共對民眾的動員過程並非只是存在簡單的動員與被動員之間的關係——有着各種現實利益需求與政治考慮的地方精英與中共的革命精英之間，其實存在非常複雜的相互滲透與相互制約關係。

例如，李軍全關於中共軍事動員的研究指出，抗日戰爭時期中共通過執行優待抗屬政策，得以壯大武裝力量、鞏固抗日根據地政權，但與此同時，中共的政治理念始終與鄉村傳統相糾葛，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其實際效果^⑤。陳耀煌認為，早期鄂豫皖交界大別山地區的共產黨員，多是地方精英家庭出身前往城市求學的知識份子，而這些早期知識份子黨員的活動往往超出了黨中央的控制範圍，因此鄂豫皖蘇區的發展其實是中共與地方精英的互動結果，是一個由合作到控制的過程^⑥。黃文治發展了陳耀煌的觀點，認為在鄂豫皖蘇區，中共與地方精英的互動是一個合作、半合作到控制的過程，合作中也有離異^⑦。

其次，將親緣、地緣等傳統因素納入考察視野，賦予底層民眾歷史主體性。裴宜理在《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Shanghai on Strike: The Politics of Chinese Labor*)一書中指出，傳統形式的農民叛亂之發生，親緣與地緣關係比起階級地位起着更為重要的作用。當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幹部着手在上海工人中開展組織工作時，他們的努力受到了工人隊伍中既有壁壘的深刻影響。中國工人階級的形成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其共同背景、文化和工作地位的影響，他們不是黨派陶工手裏的陶土，可以隨意捏弄^⑧。

王奇生與徐進分別以廣東和河北為個案，考察了大革命失敗後一段時期內中共基層黨組織與地域社會之間的關係，二者的研究都證實，在此期間隨着中共由城市轉移至農村，地方基層黨組織在白色恐怖下，大多有名無實，組織渙散，紀律鬆弛，黨員數目銳減，生存和應變能力十分脆弱。對大多數農民而言，擁護階級鬥爭或革命並不是一種自然而然的選擇：農

晚近的研究開始認為中共對民眾的動員過程並非只是存在簡單的動員與被動員之間的關係——有着各種現實利益需求與政治考慮的地方精英與中共的革命精英之間，其實存在非常複雜的相互滲透與相互制約關係。

革命話語曾經長期統治現代中國並滲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而革命過程本身不斷展示的某些特徵，可追溯到「革命」這一詞源及傳統的革命話語。已有愈來愈多的研究者開始考察共產革命中的話語在動員過程中的作用及影響。

民的宗族地緣觀念濃於階級和革命意識，地方主義和宗族性滲透於基層黨組織中；黨在力圖改造農民的同時，農民也在改造和利用當地黨的地方組織。因此，中共在基層的革命動員經常與地緣、親緣等多種因素相互纏繞¹⁹。

張宏卿、肖文燕通過考察蘇維埃運動時期中央蘇區當地的農民性格與中共的鄉村動員指出，與華北及長江三角洲相比較，這一地域的農民特質主要包括原初的營利意識、安逸的生活信念和好走極端的山區型權威性格。走向鄉村的中共通過動員、派遣任務與頒布政令等一系列舉措回應農民的訴求，快速、有效地從鄉村獲取革命資源，使廣大農民投身革命²⁰。

再次，研究視野由農村拓展到城市，研究時段由民主革命時期拓展到建國後。由於動員主要發生在尚未獲得國家權力的黨派及社會群體之間，故以往研究的主要熱點仍集中在國民黨未能有效控制的農村，研究時段也主要在抗戰及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時期。然而，正如社會運動學者詹金斯(J. Craig Jenkins)所言，資源動員理論未來的發展主要在兩個方面：其一，擴大理論半徑以處理各種不同的國家與政權；其二，提供一個在社會學層面更具有內涵的動員概念²¹。從國共內戰後期至建國初期，是中國共產黨掌握與控制的城市日益增多的關鍵時期，也是中共由農村重新轉至城市的關鍵時期。不過，此時中共在城市中的群眾基礎卻相當薄弱。因此，考察新政權建立初期中共如何建立在城市(尤其是大中城市)中的政治動員能力，逐漸為新一批學者所關注。

繼裴宜理對上海的研究之後，已有學者逐漸以城市為個案，以建國後為研究時段，考察建國初期中共在城

市的動員工作。高崢指出，建國初期中共派往杭州負責城市接管工作的地方幹部通過日常生活中召開的各種政治學習會議，將共產主義的宏觀革命意識形態灌輸到杭州城市居民的思想觀念之中。與國民黨通過無休止的徵稅實現對民眾的經濟剝削不同，中共通過在各級召開各種類型的會議，通過在會議上唱革命歌曲、背誦毛語錄，以及高呼革命口號等行為，在儀式層面對民眾進行強制性精神灌輸，使民眾對中共建立的新政權產生認同感²²。張濟順指出，1950年代的上海居民委員會在一系列政治動員中扮演了國家和社會的雙重角色。中共通過基層社會的整頓和社會生活計劃供應的實施，有效利用並成功改造了居民委員會，使之踏上新政權的體制軌道，強化了它們的國家屬性，基層社會中的「非單位人」成為國家可以調控的政治力量，國家統治社會之路開始暢通²³。阮清華以上海人民勝利折實公債推銷委員會的成立與發展過程為例，考察建國初期中共建立城市政治動員網絡的嘗試²⁴。

最後，研究開始注重話語在動員過程中的作用。趙鼎新指出，研究社會運動和革命有三個主要視角：社會變遷、國家和社會的結構及結構性行為，以及社會運動的話語(即變遷、結構、話語)。晚近的西方社會運動與革命研究開始考察話語、符號性行為，以及情感等因素在社會運動中的作用，認為某一人群雖然受到剝削，卻由於種種原因不會因此而產生很強的被剝奪感或被壓迫感，而這些感覺的產生，往往是因為受到一些本身並沒有直接受到壓迫的知識份子進行政治理念灌輸所致²⁵。

革命話語曾經長期統治現代中國並滲透到百姓的日常生活中，而革命

過程本身不斷展示的某些特徵，可追溯到「革命」這一詞源及傳統的革命話語^{②6}。已有愈來愈多的研究者開始考察共產革命中的話語在動員過程中的作用及影響。陳建華從文學角度考察「群眾」話語的演變時指出，毛澤東的創造是把群眾話語放在「國家」、「階級」、「共產主義」和「歷史」的結構中，作為一個人，不管他屬於哪一階級，其畢身的使命是革命，也就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被置身於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歷史必然進程中，而國家則是黨為實現這一偉大目標的工具^{②7}。

郭于華、孫立平從文化與儀式層面考察中共在農村發起的「訴苦」運動，認為訴苦是中國革命中重塑普通民眾國家觀念的一種重要機制。革命精英運用訴苦運動中形成和創造出來的種種「技術」，將農民日常生活中的苦難提取出來，並通過「階級」這個中介性的分類範疇與更宏大的「國家」、「社會」的話語建立起聯繫。在這個過程中，革命精英一方面通過把苦難的來源歸結於舊制度而建立了消極的舊國家形象，另一方面也通過「翻身」意識的灌輸建立了積極的新國家形象^{②8}。

喬士華的研究指出，在1920至30年代的上海，共產黨控制的紅色工會以及國民黨控制的黃色工會通過對工人日常生活中的苦難與苦難意識加以凝聚和提煉，分別鑲嵌入「階級」和「國家」的不同論述框架，達到社會動員的目的^{②9}。王奇生通過比較1920年代共產黨、國民黨與青年黨塑造的「革命」話語形態，指出國民黨的「國民革命」、共產黨的「階級革命」與青年黨的「全民革命」話語所具備的共通點，在於三個政黨對革命的積極認證和遐想式期待，將革命建構為一種與自由、解放相關聯的強勢政治文化；政治路徑的選擇不再是「革命」與

「改良」之爭，而是被建構為「革命」與「反革命」的水火不容；三黨對「革命」的競相詮釋，使得革命話語在日趨神聖化與正義化的同時，又蘊涵濃烈的任意性和專斷性成份^{③0}。

三 商榷與反思

儘管資源動員理論為我們理解中國共產革命的崛起帶來更深層次的啟發，但該理論本身並非包治百病的良藥。西方社會運動和集體行為領域的理論視角，經歷了從十九世紀中葉至二十世紀初期的古典理論（以古典社會心理學的解釋為主），到1960、70年代興起的主流理論（資源動員取向），再到1980年代以來新的綜合（社會建構論）三個發展階段^{③1}。到了1990年代中期，塔羅（Sidney Tarrow）、蒂利和麥克亞當（Doug McAdam）等一批社會運動理論的主要研究者，都開始對資源動員理論的研究模型感到厭倦，而此時這個模型已經在美國關於社會運動的學術圈裏佔有統治地位，出現了大量機械的、無甚新意、令人厭倦的學術作品^{③2}。在中共黨史研究領域，當日益增多的以資源動員理論為視角的研究成果大量湧現時，這一研究應當如何避免因視角、方法的趨同而導致學術層面的「審美疲勞」，以及應當如何開闢新的問題意識與研究路徑，儼然成為亟待解決的新問題。

資源動員理論需要回答四個重要問題：(1) 誰動員？(2) 動員誰？(3) 如何動員？(4) 為甚麼要動員？前兩個問題涉及動員過程的主體與客體，後兩個問題涉及動員的方式與目的。在已有研究中，研究者多將革命精英與底層民眾預設為動員過程展開的前提。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儘管這兩個群體

在已有研究中，研究者多將革命精英與底層民眾預設為動員過程展開的前提。儘管這兩個群體構成中國共產革命的主要力量，但倘或用動員理論將其截然二分加以考察，未免有簡化歷史之嫌。

為了動員農民起來革命，黨必須有足夠的力量和資源，去為農民提供保護和改善他們的生活；但是，只有在農民動員起來後，黨才可能獲得足夠的力量和資源。目前的研究尚無法真正回答這個悖論。

構成中國共產革命的主要力量，但倘或用動員理論將其截然二分加以考察，未免有簡化歷史之嫌。所謂「動員」，並非簡單的動員主體對動員客體所施加的一種線性的、不可逆轉的發展過程；動員過程具有多層次性。

中共從誕生之日起直至歷次革命運動的過程，是一次次不斷地方化與走向全國化的雙向互動過程。中共領導農民暴動後，黨員或團員一方面建立黨、團組織，一方面在各鄉恢復或組織農民協會，打土豪、分田地，實行土地革命。農民協會是群眾性的公開組織，屬階級性質，地主和士紳絕不允許參加；黨、團組織則是秘密性質，僅貧苦農民中的少數積極份子可以參加^③。此外，中共通過在黨外組織和社團中建立秘密黨小組的方式，既可以控制大量具社會影響力的團體組織，操縱它們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又不用直接承擔任何組織活動的後果（這一點在中共還沒有奪取政權時尤其重要）。從成本和收益的角度來衡量，這是一種最優的組織方式。

在這種全方位、多層次的動員過程中，作為動員主體的革命精英群體不斷吸納剛剛被動員起來的基層草根精英與地方精英，並依靠他們的地方經驗進行更為廣泛和深入的基層動員，直至在此區域獲得成功。待到中共開闢下一個根據地時，又會吸納新的一批被動員起來的地方精英為己所用，而原先以地方經驗的優勢進入中共領導層的精英份子，則面臨着後來者的競爭。這種領導階層成員不斷補充、篩選、升降、淘汰的結果，在宏觀層面導致了1930年代中後期中共內部的「本土派」取代「共產國際派」而獲得革命的領導權，在微觀層面則導致了「本土派」內部一批具有不同地方背景的革命精英相互之間的權力與地位之爭。

這些權力鬥爭，不僅加劇了革命精英群體內部的相互傾軋與政治清洗，並且如賀照田所言，中共逐漸發展出一套愈來愈成熟的政治、組織技術和話語，並通過這套有召喚力、說服力的論述與制度、組織、生活機制，建立一個穩定的領導核心，把新湧入的、有朝氣、有責任感的力量，不斷轉化為可以依賴的組織、精神和實踐機體。因而，即使各種難免帶有投機性的新力量湧入，不僅不會左右黨內氛圍，而且進一步，黨事實上並不需要依賴這些一旦居重要地位便容易改變黨原有朝氣的新成員^④。中共既可以將政治精英吸納到體系內，使得黨組織的體系外不再存在有活力的政治勢力，同時也可以通過管理和控制黨內精英，來控制黨外其他一切組織^⑤。

對於動員的方式與目的，資源動員理論也大有值得商榷之處。首先，由於傳統理論強調革命與社會運動參與者的非理性特徵，而資源動員理論更多強調參與革命與社會運動是人們基於理性計算後的行為，這使得已有研究較少從文化、儀式、心態的角度進行考察，而多將中共的動員看作一種革命精英基於革命理想主義與政治現實主義的調和策略而採取的迎合底層民眾現實訴求的行為。為了動員農民起來革命，黨必須有足夠的力量和資源，去為農民提供保護和改善他們的生活；但是，只有在農民動員起來後，黨才可能獲得足夠的力量和資源^⑥。

面對這個動員過程中的悖論性困境，目前的研究尚無法真正回答中共何以打破困境，從而在短短二三十年中一舉超越無論在正當性與統治資源上都居於優勢地位的國民黨。針對此問題，裴宜理強調從情感的角度來考察革命動員，認為情感模式具有感召

普通群眾做出革命行動的力量，使得我們能夠更好地理解諸如意識形態、組織形式、符號體系，甚至階級劃分等受到情感影響的多種方式^②。然而，如趙鼎新所言，以情感為基礎和以理性選擇為基礎的理論，最後都會碰到同樣的問題，即對任何一個具體的行動來說，我們根本無法搞清支配這一行動的到底是理性選擇還是情感驅使，因為它們往往是同時並存且難以分離的^③。因此，如何平衡二者在動員過程中起到的作用，仍然是有待回答的問題。

其次，由於資源動員理論秉承自由主義經濟學中將人視作具有理性選擇能力，並追求個體利益最大化的假設，重在考察各種機會與條件制約下個體利益權衡與行為選擇的複雜性，故其必須面對集體行動中的「搭便車」問題。柏珀金 (Samuel L. Popkin) 在《理性的農民》(*The Rational Peasant: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ural Society in Vietnam*) 中指出：對革命的集體利益的認同本身並不一定足以使農民個人積極參加革命運動^④。何高潮也指出，既然革命成果人人有份，從個人的角度看，每個農民的最佳選擇就會是「坐享其成」，等別人去奮鬥和承擔參與集體行動的風險^⑤。中共在1928年的一份根據地工作報告中提及，地方農民「雖感覺須要鬥爭，但恐不能成功有所畏懼，同時又因耕種忙，便不願意鬥爭，有幾處群眾竟向我們請求停止鬥爭，如九江、德安、吉安」^⑥。湘贛邊界臨時特委在致江西及湖南省委的一封信中也指出：「在群眾組織方面，亦非常軟弱，不能實際鬥爭，有些地方的群眾，僅是因為軍事勢力的征服敷衍鬥面而已。」^⑦因此，革命動員者必須發揮「政治企業家」的作用，找到克服「搭便車」的具體機

制，使參加革命成為農民個人的最佳選擇^⑧。遺憾的是，目前運用資源動員理論研究中國革命的已有研究中，鮮有人注意到柏珀金與何高潮指出的上述問題。需要指出的是，回答這一問題，正是探究中國的共產革命何以從1920年代的屢遭挫敗轉變為1940年代的翻天覆地的一個重要路徑。

資源動員理論的核心問題在於探究地方精英、底層民眾等各種社會力量如何被中共革命精英基於構建現代民族國家這一目標而整合在一起。大革命失敗後，中共長期蟄伏鄉村社會，由此開啟了一個長期地方化的過程。而在此後二十餘年的時間裏，隨着自身實力的逐漸壯大，中共從土地革命時期的蘇維埃政府、抗戰時期的邊區政府，發展至1949年的中央政府，從地方層面重返國家層面。黃文治在對皖西大刀會的考察中指出，大革命失敗後，中共在從城市轉入鄉村的過程中，採取多管齊下的方式進行調適與分化瓦解，將原本屬於民間自衛武裝團體的大刀會從地方性叛亂勢力轉化為全國性革命勢力，從而將大刀會叛亂這種傳統鄉村集體行動形式轉化為自主跨地域性、強組織性，並帶有濃厚階級性的現代集體行動形式^⑨。該研究為我們開啟了一條新的思路，即考察中共的動員話語如何從面向地域社會的基層民眾向構建現代民族國家轉變？這套動員話語在基層社會衍生出甚麼樣的動員行為？底層民眾在何種程度接受這套話語論述與動員行為？既然已有研究揭示出底層民眾具有相當的歷史主體性，為甚麼他們又最終走向了個人臣服於社會和國家的困境？

此外，儘管目前的研究已經將底層民眾納入視野，但囿於資料限制以及價值觀的影響，大多數研究者還是站在精英的立場上，自上而下地考察

誠如裴宜理所說，一個人只有通過歷史，通過研究事件如何展開，才能理解運動和過程。如何在資料的爬梳中深入底層政治的內在結構，尋找共產革命發生的深層動因，也是研究者努力的新方向。

底層社會。精英政治與國家政權相聯繫，以制度或秩序的方式表現為一種強制性手段。精英無論是否掌握了國家權力，都試圖塑造自己的合法性，並將之意識形態化；底層政治則更多地是底層民眾的自發行為，其行為方式可能是隱性、自發而零散的，同時，底層政治是反應性或應對性的，它是對現實生活中的困苦或不滿尋找解釋的方式和解決的路徑^{④⑤}。誠如裴宜理所說，一個人只有通過歷史，通過研究事件如何展開，才能理解運動和過程^{④⑥}。如何在資料的爬梳中深入底層政治的內在結構，尋找共產革命發生的深層動因，也是研究者努力的新方向。

註釋

① 華爾德(Andrew G. Walder)著，龔小夏譯：《共產黨社會的新傳統主義：中國工業中的工作環境和權力結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頁1。

②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著，姜進譯：〈中國革命中的知識精英與底層教育〉，載許紀霖主編：《知識份子論叢》，第六輯(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7)，頁198。

③ 杜贊奇(Prasenjit Duara)著，劉永濤譯：〈中國近代史上的國家與公民社會〉，載汪熙、魏斐德(Frederic Wakeman, Jr.)主編：《中國現代化問題——一個多方位的歷史探索》(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1994)，頁383。

④ 斯考切波(Theda Skocpol)著，王學東、何俊志譯：《國家與社會革命：對法國、俄國和中國的比較分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頁5。

⑤ 李斌：〈政治動員與社會革命背景下的現代國家建構——基於中國經驗的研究〉，《浙江社會科學》，2010年第4期，頁33。

⑥ 鄒讜：〈政治研究社會科學化——評《地主·農民·共產黨：社會博弈

論分析〉》，載甘陽編：《中國革命再闡釋》(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2)，頁264。

⑦⑧ 參見于建嶸：〈精英主義束縛底層政治〉，《人民論壇》，2010年7月(下)，頁24；25。

⑨⑩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冊(台北：聯經出版公司，1998)，頁22；265。

⑪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學界對於「資源動員」的概念並沒有統一界定。「革命動員」、「政治動員」、「社會資源動員」、「道德資源動員」、「社會動員」、「民眾動員」等詞語曾先後得到使用。由於本文着眼點並非剖析「動員」概念與理論脈絡，故在此不展開贅述。

⑫ 趙鼎新：《社會與政治運動講義》(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6)，頁180。

⑬ 馮仕政：〈西方社會運動研究：現狀與範式〉，《國外社會科學》，2003年第5期，頁69。

⑭ Bert Klandermans,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Social-Psychological Expansions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49, no. 5 (1984): 583-97.

⑮⑯ J. Craig Jenkins,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nd the Study of Social Movements",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vol. 9 (1983): 527-29; 527-53.

⑰⑱⑲ 參見趙鼎新：〈西方社會運動與革命理論發展之述評——站在中國的角度思考〉，《社會學研究》，2005年第1期，頁172；173；194。

⑳ 李軍全：〈軍事動員與鄉村傳統：以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優待抗屬為例〉，《歷史教學》，2011年第2期，頁32-36。

㉑ 陳耀煌：《共產黨·地方菁英·農民：鄂豫皖蘇區的共產革命(1922-1932)》(台北：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2002)，頁455-57。

㉒ 參見黃文治：〈民眾動員視野下的中共與富農——以鄂豫皖蘇區為中心的考察(1927-1932年)〉，《開放時代》，2010年第10期，頁36-59。

㉓ 裴宜理(Elizabeth J. Perry)著，劉平譯：《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頁252-53。

⑲ 參見王奇生：〈黨員、黨組織與鄉村社會：廣東的中共地下黨（1927-1932年）〉，《近代史研究》，2002年第5期，頁1-44；徐進：〈黨、革命動員和地域社會：論中共河北黨組織（1928-1934）〉，《史學月刊》，2007年第12期，頁70-77。

⑳ 張宏卿、肖文燕：〈農民性格與中共的鄉村動員模式——以中央蘇區為中心的考察〉，《開放時代》，2010年第10期，頁60-77。

㉑ James Z. Gao, *The Communist Takeover of Hangzhou: The Transformation of City and Cadre, 1949-1954*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4), 97-124.

㉒ 張濟順：〈上海里弄：基層政治動員與國家社會一體化走向（1950-1955）〉，《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2期，頁178。

㉓ 阮清華：〈中國共產黨建立城市政治動員網絡的初步嘗試——上海推銷人民勝利折實公債論述〉，《中共黨史研究》，2010年第4期，頁22。

㉔ 陳建華：〈論現代中國「革命」話語之源〉，載《「革命」的現代性：中國革命話語考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頁1。

㉕ 陳建華：〈百年醒獅之夢的歷史揶揄——「群眾」話語與中國現代小說〉，載《「革命」的現代性》，頁269。

㉖ 郭于華、孫立平：〈訴苦：一種農民國家觀念形成的中介機制〉，載楊念群、黃興濤主編：《新史學：多學科對話的圖景》，下冊（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3），頁505-24。此外，李里峰、彭正德等人從微觀層面考察建國初期土改運動中作為政治動員技術的「訴苦」及農民政治認同感的形成，對郭于華、孫立平的研究作了跟進。參見李里峰：〈土改中的訴苦：一種民眾動員技術的微觀分析〉，《南京大學學報》，2007年第5期，頁97-109；彭正德：〈土改中的訴苦：農民政治認同形成的一種心理機制——以湖南省醴陵縣為個案〉，《中共黨史研究》，2009年第6期，頁112-20。

㉗ 喬士華：〈從社會動員到意義建構——20世紀20-30年代的上海工會〉（華中師範大學碩士學位論文，2004），未刊稿，頁24-43。

㉘ 王奇生：〈「革命」與「反革命」：一九二〇年代中國三大政黨的黨際互動〉，《歷史研究》，2004年第5期，頁84。

㉙ 劉能：〈怨恨解釋、動員結構和理性選擇——有關中國都市地區集體行動發生可能性的分析〉，《開放時代》，2004年第4期，頁58。

㉚④⑤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著，閻小駿譯：〈底層社會與抗爭性政治〉，《東南學術》，2008年第3期，頁4-8；8。

㉛ 賀照田：〈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的歷史意涵：從梁漱溟的視角看〉，《思想》（台北），2009年第13期，頁124-30。

㉜ 尹鈺：〈「黨」治史，還是「治黨史」？——評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年-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公法評論，www.gongfa.com/yintaiwangqisheng.htm。

㉝④⑥ 何高潮：《地主·農民·共產黨：社會博弈論分析》（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7），頁28；14-15；15。

㉞ 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 著，李寇南、何翔譯：〈重訪中國革命：以情感的模式〉，《中國學術》，2001年第4期，頁121。

㉟ 參見于建嶸：《抗爭性政治：中國政治社會學基本問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頁56。

㊱ 〈江西工作近況——綜合性報告〉（1928年7月8日），載江西省檔案館、中共江西省委黨校黨史教研室編：《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頁4。

㊲ 〈湘贛邊特委信〉（1929年3月17日），載《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上冊，頁60。

㊳ 黃文治：〈從叛亂走向革命：保土意識、階級意識及鄉村革命動員——以中共與皖西大刀會為中心的探討（1922-1932）〉，《學術界》，2010年10月，頁186。

胡悅晴 杭州師範大學城市學研究所
講師，上海華東師範大學歷史學博士。